



宋夏史探研集

李华瑞 / 著



科学出版社



宋夏史探研集

李华瑞 / 著



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夏史探研集 / 李华瑞著.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16.6

ISBN 978-7-03-049046-9

I. ①宋… II. ①李… III. ①中国历史—宋代—文集 ②中国历史—西夏—文集 IV. ①K244.07-53 ②K246.3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41771 号

责任编辑: 杨 静 陈 亮 / 责任校对: 郭瑞芝

责任印制: 肖 兴 / 封面设计: 左 讯

编辑部电话: 010-64026975

E-mail: chenliang@mail.sciencep.com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6 年 6 月第 一 版 开本: 720 × 1000 1/16

2016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20 1/2

字数: 359 000

定价: 86.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序

李华瑞

这是我的第四部个人论文集，主要收录近四五年来发表的论文。论文集大致分六个方面的内容。前三组文章均涉及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第一组文章对宋代国家形象、社会变革运动、地方社会、酒库与军费等问题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我个人始终坚持认为由国家政策和政治体制导致宋代积贫积弱的国家形象，不能与衡量经济文化发展水平简单的等同起来。其实，任何时代，一个大国都有文治武功，偏废哪一方面都不是客观的正视历史。《孟子》的地位是宋人抬起来的，其功臣主要是王安石和朱熹。现今所谓的孔孟之道始自宋朝。以往对于孟子升格运动和从思想史层面对孟子的研究已有很多成果，但是为什么宋人看重孟子，孟子与宋代士大夫的政治追求、践行有什么关系，孟子的思想在社会变革运动中又起了什么作用，这些似还有相当大的空间需要发掘，近两年，我的研究重点将向这方面倾斜。《王安石与孟子》是我的初步尝试。

几年前与明史学界的朋友交流，说到宋代政府在经济方面的一些政策、措施和作为，明史学界朋友不约而同地说宋朝是大政府，明朝是小政府，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2013年、2014年两次参加由《历史研究》编辑部与南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召开的学术研讨会都涉及国家与社会这一主题，于是我尝试着写了一篇三四万字与明朝比较的文章，后经多位朋友批评，在原来基础上修改完成了本论文集的第二组两篇文章，虽然发表了，内心还是有些忐忑，希望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第三组文章是在出版《宋代荒政史稿》前后写成的，除了《论宋代自然灾害与荒政》一篇是书稿的结论外，基本是对此前研究的补充和拓展，并有一些新的认识。《抄割救荒与宋代赈灾户口的调查与统计》希望能对宋代人口

研究提供新的佐证。

2004年到北京工作以后，在学术交流方面收益颇多，由于汉唐史学界朋友的引荐，近几年到新疆阿克苏、吐鲁番等地参加与丝路交通相关的学术会议，第四组文章即是为参加会议所写的论文，当然我的话题还是与此前所做宋夏关系史研究分不开，在此基础上有所拓展。但是到新疆（宋朝的外国西州、龟兹、于阗）参加会议，不仅感到地理那么的遥远陌生，而且确有小天下之慨。宋代历史文化的内涵确实较前代深入了许多，但是在眼界和格局上也狭小了许多。在库车、阿克苏、吐鲁番看到太多的汉唐遗迹和遗物，而属于宋代的竟只在新疆阿克苏博物馆收藏看到一件标为“宋代”的绿绸袍，丝绸质地，阿瓦提县古迹遗址采集，衣长132厘米，袖通长173厘米，年代不详。为此感慨唏嘘良久。宋建国直至宋神宗即位之前对秦凤以西的地区基本采取放弃的态度，及至坐大西夏，再想通过变法来重新经营，历史没有再给宋人机会，秦凤以西沦为宋朝国史的“外国”，着实令人扼腕叹息。由此联想到现今的宋史研究，真的不能盲目因循宋人自我欣赏式的自豪而对其点赞，要越过宋人的局限看看外部的精彩世界。由此想到邓广铭先生提倡“大宋史”研究，确是高明的见解。

第五组的两篇文章是承担史金波先生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委托项目“西夏文献文物研究”子课题“天盛律令”与“庆元条法事类”比较研究的阶段成果。

第六组是应报刊之约写的几篇学习心得，以及书评、书序和悼念师友的文章。

附录所收文章是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前辈学者邹兆辰先生撰写的，邹老师在许多年前曾访谈过漆侠师，感谢邹老师奖掖后进，帮我梳理出道以来的学习生涯，使我“知不足”、“知困”，期望在今后的研究中能够有所“自反”和“自强”。

2016年5月6日

目 录

序·····	i
宋朝“积弱”说再认识·····	1
王安石与孟子——孟子与宋代士大夫政治研究之一·····	16
南宋地方社会管窥——以阳枋《广安旱代赵守榜文》为中心·····	32
南宋的酒库与军费·····	45
宋、明对“巨室”的防闲与曲从·····	58
宋、明税源与财政供养人员规模比较·····	76
抄割救荒与宋代赈灾户口的调查统计·····	104
论宋代的自然灾害与荒政·····	122
宋代地方官员与救荒·····	136
荒政与宋代民变（农民起义）的规模·····	150
再论南宋荒政的发展·····	162
略论宋夏时期的中西陆路交通·····	179
北宋与龟兹·····	196
论北宋经营陆路东西交通·····	213

《天盛律令》修纂新探——《天盛律令》与《庆元条法事类》	
比较研究之一·····	233
再论《天盛律令》的修纂·····	249
漆侠先生的学术贡献与治学方法·····	269
西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	272
文献与宋史研究的几个特点·····	275
读书的黄金时代·····	279
读《煦园春秋—水梓和他的家世》书后·····	281
《20 世纪中国美术纪年》读后感·····	283
《蔡京、蔡卞与北宋晚期政局研究》序·····	286
悼念宁可先生·····	289
畏友浦江·····	295
附录	
宋史研究领域的新开拓——访李华瑞教授·····	303
本书所收文章初刊信息·····	321

宋朝“积弱”说再认识

“积贫积弱”是20世纪初以来对宋朝历史的一个基本评价，近一二十年来学界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笔者亦有所回应。^①对于积贫，笔者以为不能简单地把“由国家政策和政治体制导致的积贫问题与衡量经济文化发展简单的等同起来”。也就是说“积贫”实质上是财政入不敷出的表现，虽然宋人未有直言“积贫”，但是宋人所言的“财匮”“财困”与“积贫”可以看作是同义词。对此学界已作了较为深入的探索^②，无需多言，下面仅就“积弱”问题再谈几点看法。

一、宋代“积弱”说的源流

有学者以为“积贫积弱”成说的出现，与晚清以来中国备受帝国主义欺凌之时代背景有关。^③其实，这种说法并不确切。因为“积弱”一说本自宋人，宋人所言的“积弱”又往往包涵着现今指称“积贫积弱”的意义（详见后论），而且“积弱”也是元明清历代对宋朝的基本看法。

宋人的说法，可以从两个层面来理解：一是始于南宋人对北宋历史的反思。吕中说：“元昊所以敢于凭陵者，人皆以为宝元、康定积弱之故。”^④方凤说：“国家惩鉴五季，一意儒臣，尾大之弊虽除，然酿成积弱。”^⑤林駟亦有相似说法：“国朝立国之势，自建隆立极以来，臣民习于宽厚，风俗狃于治安。天下之势近于委靡而不振；朝廷之制，几于废弛而不举。兵骄士弛，吏玩财困，

① 有关讨论情况参见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

② 详见汪圣铎：《两宋财政史》，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7月；包伟民：《宋代地方财政史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7月。

③ 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第5期；李裕民：《破除偏见，还宋代历史以本来面目》，《求是学刊》2009年9月第36卷第5期；葛金芳：《两宋历史地位的重新审视（笔谈）》，《求是学刊》2009年第9期第36卷第5期；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3—6页；邓小南：《宋朝历史再认识》，《河北学刊》2008年第4期。

④ 吕中：《宋大事记讲义》卷一二，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

⑤ 方凤：《存雅堂遗稿》卷三《上书·上陈丞相书》，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积弱之弊，识者痛之。”^①“嘉祐以来失因循，嘉祐、治平以来积宽之弊，转为舒缓积弱之弊，流为安靡，天下之务几于柔软而不振，朝廷之制几于废弛而不举，皆因循之过也。”^②

二是南宋人对自身所处时代的认知。王炎在与洪适的信中论及南宋的国势说：“炎以为天下之事，强则易振，弱则难立，积弱则难立也滋甚，何者？势不便而气先索也。”^③魏了翁说，南宋以来由于权臣以和戎之名“操持国柄，士大夫靡然从之，堕党崇讎，损威纳侮，卒之国势积弱，士气剥丧”^④。真德秀在理宗初期上奏疏强武备时说：“圣明在上，躬履节俭，无横恩，无滥予，独不可举之以修武备乎？况以国势积弱之余，不若是，无以奋张而兴起之。”^⑤

另外，宋人虽然并不一定使用积弱一词，但在与辽夏金（蒙）元相比较中体认宋朝处于弱势。宋仁宗时期，韩琦慨叹宋军“屯二十万重兵，只守界壕，不敢与敌。中夏之弱，自古未有”^⑥。富弼在向宋仁宗《条上河北守御十二策》中比较了辽与宋的国势后痛心地说：“北敌之强既如此，中国之弱又如此。”^⑦宋神宗时期欲变法有为，王安石虽然一再用“四夷皆衰弱”^⑧来安慰宋神宗，但他也体认到：“累世以来，夷狄人众地大，未有如今契丹。”^⑨北宋末期金灭辽、进攻宋之后，大多数士大夫都切身感到宋的兵弱，有的大臣对金军产生了极大的畏惧，《靖康前录》曰……又曰李邕归自贼垒，盛谈贼强我弱，以济和议，谓贼人如虎，马如龙，上山如猿，入水如獭，其势如泰山，中国如累卵，时人号为‘六如给事’”^⑩。宋钦宗“遣宇文虚中往敌营报书”则直陈：“彼此强弱之势，则本朝兵力寡薄，难以迎敌。”^⑪建炎三年（1129年），大臣慨叹：“今夷虏日以盛强，中国渐致衰弱。”^⑫南宋中后期宋的弱势，更是士大夫们的共识，黄

① 林駟：《古今源流至论》后集卷四《国势》，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② （不著撰人）《群书会元截江网》卷一九《法度》，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③ 王炎：《双溪类稿》卷一九《见洪宰》，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④ 魏了翁：《鹤山集》卷三三《代南叔兄上费参政〈壬寅〉》。

⑤ 真德秀：《西山文集》卷一四《对越乙稿奏札·十一月癸亥后殿奏已见札子二》。

⑥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三一“庆历元年二月丙戌”，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3099页。

⑦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五〇“庆历四年六月戊午”，第3655页。

⑧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二“熙宁五年夏四月壬子”，第5628页。

⑨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六“熙宁五年闰七月戊申朔”，第5726页。

⑩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二八“靖康中帙三·起靖康元年正月六日壬申尽七日癸酉”，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209页。

⑪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三三“靖康中帙八·起靖康元年二月一日丁酉尽四日庚子，朝廷报书”，第245页。

⑫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二四“炎兴下帙二四·起建炎三年三月二日庚辰尽其日，周紫芝上书”，第910页。

震参加修撰宁宗、理宗两朝《国史》《实录》时，指出当时的四大弊政“曰民穷、曰兵弱、曰财匱、曰士大夫无耻”^①。开庆元年（1259年），忽必烈“南伐”，召见宋降将杜瑛“问计，瑛从容对曰：‘汉唐以还，人君所恃以为国者，法与兵、食三事而已。国无法不立，人无食不生，乱无兵不守。今宋皆蔑之，殆将亡矣。’”^②文天祥《御试策》中分析南宋国势时指出：“闻古今天下能免于弱者，必不能免于贫；能免于贫者，必不能免于弱，一利之兴，一害之伏，未有交受其害者，今之兵、财则交受其害矣。”^③

至于金元明清人对宋的看法。金朝在与宋共谋海上之盟的过程中，已深知宋朝“兵弱”^④，金哀宗在其临灭亡之时还轻蔑地说：“北兵（指蒙古）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至于宋人，何足道哉。朕得甲士三千，纵横江淮间有余力矣。”^⑤

元朝刘岳申说：“宋视汉唐，内无女色、阉寺之祸，外无强藩、外戚之变，经学不为无功，而国势不免积弱。”^⑥

元史臣《进宋史表》云：“大概声容盛而武备衰，论建多而成效少。”^⑦对此评价，明人陆深以为：“宋之国是，实符斯言。”^⑧

明朝人唐顺之在《宋神宗皇帝九军新阵辩》中云：“神宗为九军似矣，……可知操纵开阖，进退出入，决善政也，积弱累败，至于丧亡，宜哉。”^⑨明万历年间魏学曾在接受总督陕西三边军务时向执政上书说：“虏自款贡来，疆吏相袭苟安，惧开边衅，而武备日不竞，此宋人积弱之渐也。”^⑩

明清之际，王夫之在《宋论》中批评宋的军政时说：“岐沟一蹶，终宋不振，吾未知其教之与否，藉其教之，亦士戏于伍，将戏于幕，主戏于国，相率以嬉而已。呜呼！斯其所以为弱宋也欤！”“若夫仁宗之过于弛而积弱也，实不在贫也。”^⑪

① 《宋史》卷四三八《黄震传》，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2992页。

② 《元史》卷一九九《杜瑛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4474页。

③ 《文山集》卷三，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④ 徐梦莘：《三朝北盟会编》卷一六“政宣上秩十六·起宣和五年四月十七日庚子尽二十八日辛亥”，引《秀水闲居录》，第116页。

⑤ 《金史》卷一一九《完颜娄室三人传》，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第2599页。

⑥ （元）刘岳申：《申斋集》卷一五《杂著·策问三史》，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⑦ 《宋史》附录《进〈宋史〉表》，第14255页。

⑧ （明）陆深：《俨山外集》卷二六《史通会要》下，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⑨ （明）唐顺之：《武编》前集卷四《宋神宗皇帝九军新阵辩》，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⑩ 沈鲤：《亦玉堂稿》卷一〇《明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确庵魏公墓志铭》，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⑪ 王夫之：《宋论》卷二《太宗》、卷六《神宗》，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35、118—119页。

清朝乾隆时期君臣对宋的积弱有较多评议。编纂《续文献通考》的大臣云：“马端临作刑考其序，略曰：‘苟慕轻刑之名，而不恤惠奸之患，则非圣人明刑弼教之本意。’盖见宋承积弱之余，法不振而人多玩，故为此论也。”^①其后四库馆臣在为宋人数部著作的提要中使用积弱来形容宋的国势，如为王安石《周官新义》：“安石之意，本以宋当积弱之后，而欲济之以富强。”^②《何博士〈备论〉》提要云：“夫北宋之衅，由于用兵，而致衅之由，则起于狃习晏安，废弛武备，驱不可用之兵而战之，故一试而败，再试而亡。南渡以后，卒积弱以至不振。”^③岳珂《宝真斋法书赞》提要云：“珂处南渡积弱之余，又承家难流离之后。”^④乾隆皇帝更是多次评议宋的积弱。他对宋仁宗庆历年间富弼出使契丹议岁币事件“富弼至契丹议增币，拒称‘献纳’二字，契丹遣使与弼偕来，帝用晏殊议，以纳字许之目”，有如下一段评议：

贡献义同，纳亦贡献之谓。富弼争执再三，稍有丈夫气，而其时宰相畏懦，务为苟安，仁宗又急图了事，遂至名实俱亏。积弱之势既成，盖见其恢恢不振，诚可笑耳。^⑤

又在《南城》一诗中评议宋金海上之盟时写道：

道旁古南城，城废存土阜。云米（宋）拒契丹，筑此夹河守。和金计灭辽，唇齿患互受，外夷尚知此（谓高丽对宋使言），小利目前取。诎惟失河北，汴亦不能有。国势成积弱，况复政多咎。方士及权奸，岂堪俚指数（叶）。虚内乃贪外，屋丰閭家藪。五国固其宜，炯戒传不朽。^⑥

近代以来，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第六编两宋之部第31章标题即为“贫弱的新中央”，其下之细目则为“宋代对外之积弱不振”“宋室内部之积贫难疗”，其结论是“始终摆脱不掉贫弱的命运”。^⑦漆侠先生对积弱是这样界定的：“这就是封建统治对内日益不能控制农民的暴动，对外日益无力抗拒辽夏的侵

① 《钦定续文献通考》卷一三五《刑考》，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② 永瑤、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周官新义〉提要》，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

③ 永瑤、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何博士备论〉提要》。

④ 永瑤、纪昀等：《四库全书总目·〈宝真斋法书赞〉提要》。

⑤ 《评鉴闡要》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⑥ 《御制诗二集》卷二一《因取丙辰以迄丁卯所作略加编定都为四十四卷古今体计四千一百五十首有奇·乾隆己巳夏六月望日》，文渊阁《四库全书》影印本。

⑦ 李裕民：《宋代“积贫积弱”说商榷》，《陕西师范大学学报》2004年5期。

扰，从这两者所包含的实际内容中，可以看到它们之间的联系。因之，积贫、积弱不仅是封建国家的外部标记，而且透过积贫、积弱的现象，还可以看到整个政治经济当中的复杂关系”。^①1963年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第三册（邓广铭先生执笔）在叙述宋神宗起用王安石变法内容时亦云：“富国强兵，改变积贫积弱的现状。”

港台学者也有论列，如1989年林瑞翰在《宋代政治史》的结论中说：“世或以宋代先则见欺于辽，继则见欺于金，终为蒙古所灭，而谓宋代兵力之积弱不振，盖肇自集权政策之弊。”^②

当然，对于宋朝的整体估价，从北宋中期以降也多有赞誉，程颢所言“尝观自三代而后，本朝有超越古今者五事：如百年无内乱。四圣百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百年未尝诛杀大臣。至诚以待夷狄。此皆大抵以忠厚廉耻为之纲纪，故能如此。盖睿主开基，规模自别”^③，就比较有代表性。明人陈邦瞻在《宋史纪事本末》序中盛赞两宋文治超过汉唐：“大抵宋三百年间，其家法严，故吕、武之变，不生于肘腋；其国体顺，故莽、卓之祸，不作于朝廷。吏以仁为治，而苍鹰乳虎之暴，无所施于郡国；人以法相守，而椎埋结驷之侠，无所容于闾巷。其制世定俗，盖有汉、唐之所不能臻者。独其弱势宜矫，而烦议当黜，事权恶其过夺，而文法恶其太拘。”^④则是旧史家较为客观的评价，20世纪初以来，学界颇推重宋代研究，“以宋为制高点研治整个中国历史文化提出的各项重大问题，如‘宋学’渊源、宋代史学和新宋学等，引起各科学人的长期讨论”^⑤。而日美学者从宋代是中国近世开始的角度，对宋代经济文化给以高度评价。^⑥

但是宋朝积弱，正如前揭，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来讨论宋代积弱，是从北宋中期至清历代对宋的评价，并不完全与晚清以来中国备受帝国主义欺凌之时代背景有关。也就是说，宋朝积弱和宋朝经济文化发达是评价宋朝历史地位的两个方面，笔者曾说过：“不论从哪个角度讨论宋代的历史地位，都不应以一个方面掩盖另一个方面，也就是说既不能以‘积贫积弱’来概括宋代的全部历

① 漆侠：《王安石变法》第一章《宋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系》第一节《积贫积弱局面的形成》，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第14、25页。

② 林瑞翰：《宋代政治史》，台北：正中书局，1992年，第520页。

③ 《二程集·河南程氏遗书》卷一五，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159页。

④ 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北京：中华书局，1977年，第1192页。

⑤ 桑兵：《民国学人宋代研究的取向及纠结》，《近代史研究》2011年第6期。

⑥ 参见李华瑞：《“唐宋变革”论的由来与发展》，《河北学刊》2010年第4、5期。

史特征，也不能仅从宋代社会经济、文化取得巨大进步而忽略宋代历史存在的‘民穷’‘财匮’和积弱不振的基本事实，偏废任何一面都不是对历史的客观评价，更不是对历史负责的态度。”^①

二、宋与辽、西夏、金、（蒙）元的攻防战

根据上述，对于宋朝的积弱，一般有两种认知：一种是指宋朝在军事能力上的积弱，一种则是指宋朝国势的积弱。目前讨论宋朝积弱问题，对这两种看法都提出质疑，特别是对于宋朝国势积弱的说法，道理很简单，宋朝的经济、科技整体发展水平远不是辽、西夏、金、（蒙）元所能比拟。至于对宋朝军事能力的积弱，过去人们往往叹惋其不武，而近年有学者以为就国防而言，宋代不见得“积弱”，但似未有专题的讨论。

其实宋人不是不能打仗，过去论者在论及宋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争时，往往多注意双方的进攻战，而对双方的防御战，特别是在辽、金、蒙古深入南北宋境内后宋军反击侵略的防御战，则没有给以足够的重视。纵观两宋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争的重要战役，若以进攻和防守这两种战争基本形式和双方进行战争的目的来衡量，宋的军事失败基本上都发生在宋发动的进攻战役方面，而宋在境内抵抗来自辽、西夏、金、（蒙）元进攻的防御战，则宋军多能取得不俗的战绩。

先看宋辽战争。^②从979年宋发动收复燕云地区高粱河战役到1004年辽进攻宋，在澶渊城下订立和约，长达25年，其间北宋主动进攻的高粱河之战（979年），雍熙北伐（986年）包括岐沟关之战、陈家谷之战、君子馆之战三大战役均以宋方大败告终。^③

防御性战役有：满城会战（979年）辽大败，瓦桥关—雄州之战（980年）辽军小胜但未攻破宋军雄州城，辽军亦受创。辽在河北、河东先后三路南侵（981年），皆败。徐河之战（989年）辽败、裴村等之战（999—1000年）宋

① 李华瑞：《改革开放以来宋史研究若干热点问题述评》，《史学月刊》2010年第3期。

② 这里所讲宋与辽、西夏、金、（蒙）元战争攻防战，主要是指具有较大规模或具有战略性质的战争，一般边区之间较小规模，或扰边性质的战争不包括在内。以下同。

③ 详见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年。《中国历代战争史》认为：“君子馆之战”是辽南侵，曾瑞龙据当时的战略形势分析认为是宋方主动进攻，今从之。

败，遂城之战（1001年）宋胜，望都之战（1003年）宋败。^①

澶渊之役（1004年），辽深入宋境，宋在军事有利局面下与辽签订“澶渊之盟”。其后直到宣和二年（1121年）宋徽宗欲谋复燕云之地与金订立海上之盟，宋辽间未发生直接战役。宣和四年，宋两度由南向北进攻辽军把守的幽州城，大败而归。^②

其次，宋与西夏战争。自公元982年李继迁反宋至北宋灭亡、金占领宋陕西诸路、宋夏脱离直接联系为止，在近150年的时间里，双方处在交战和敌对状态的时间约占四分之三以上。但李继迁时期对宋的进攻，因其自身战争力量很有限，宋夏之间的战争尚没有明显的战略意义上的进攻和防御。及至元昊反宋，宋夏战争全面爆发，宋夏三次大的战役：三川口之战（1040年）、好水川之战（1040年）、定川寨之战（1042年），虽都因西夏侵宋而爆发，但具体战役则是宋军主动出击迎战西夏，元昊则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各个击破，宋军惨败。

宋神宗时期实施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变法运动，对西夏展开积极进攻。绥州啰兀城之战（1070—1071年）、灵州之战（1081年）、永乐城之战（1082年）均以宋军失败而告终。其后西夏挟永乐城大胜的余威，数次围攻北宋边城兰州，兰州城坚，西夏不能克。宋哲宗绍圣至徽宗政和时期对西夏依然采取进攻的态势，但不是采取大规模征伐主动进攻的形式，而是采取在宋夏边境西夏一侧进筑堡垒，步步为营，蚕食西夏。西夏力图阻扰宋的蚕食，遂爆发具有战略决战性质的争夺平夏城战役（1098年），西夏是主动进攻一方，宋取得平夏城保卫战大捷。^③

再次，宋金战争。从靖康元年（1126年）金发动第一次灭北宋战争至1234年金灭亡，在近110年间，可以1141年订立绍兴和议为中轴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宋金战争经历了一个由宋军全面溃败望风而逃到逐渐砥砺抗衡金军的过程。“自金虏入中原，将帅望风奔溃，未尝有敢抗之者。”^④“挟劲骑，直越燕赵，躡齐鲁，遂至句吴以观南海。中有大河、江流、孟门、太行

① 三军大学编著：《中国历代战争史》第11册，第十四卷《宋、辽、夏、金（上）》，北京：军事译文出版社翻印，1983年。

② 陈乐素：《宋徽宗谋复燕云之失败》，《辅仁学志》1933年第4卷第1期。后收入氏著：《求是集》第一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③ 详见李华瑞：《宋夏关系史》第六章《宋夏战争论（中）——宋夏战争重要战役概述》，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

④ 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一九《十三处战功》，北京：中华书局，2000年，第449页。

之险而不能为之限，所过城邑，无不开门迎劳，行留自恣，莫敢袭逐。”^①其间金两次南下攻取东京，南宋建炎年间两次渡江以及富平之战（1126年），是两宋遭遇击溃战的典型战役。建炎以后，南宋军抗击金军是可以值得一提的战役，据宋孝宗乾道二年（1166年）八月甲午，立中兴以来十三处战功格目^②，其中绍兴和议前被列为战功的有五处：“张俊明州城下（1129—1130年）、韩世忠大仪镇（1134年）、吴玠杀金平、和尚原（1130、1133年）、刘锜顺昌府（1140年）五处，依绍兴十年九月二十二日指挥。”^③由于绍兴十年（1140年）九月秦桧当政，这五处战功没有包括已被关押的岳飞指挥的郾城之战、颍昌之战（1040年）两次战役。有研究者以为：“南宋绍兴时，宋军五次大捷，即和尚原之战、仙人关之战、绍兴十年刘锜指挥的顺昌之战、岳家军进行的郾城之战和颍昌之战。都是大败完颜兀术亲率的金军主力，而吴玠指挥的则属前两次。”^④前一阶段除了宋军防御反击取胜战役外，靖康元年宋金太原之战异常惨烈，宋军在王禀率领下阻击金军西路军于太原城下250多天。^⑤

后一阶段，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至隆兴二年（1164年），爆发第二次金宋战争。此次战争有四次重要战役，即胶西海战（1161年）、采石之战（1161年）、德顺之战（1162年）和符离之战（1164年）。前两战是完颜亮打着混一天下的旗号进攻南宋，以金军的失败而告终，后两战是宋孝宗欲恢复故土北上攻金，以宋军的失败而告终。双方签订隆兴和议。^⑥其后宋宁宗时韩侂胄主政，积极北伐，开禧二年（1206年）南宋在宿州和唐、邓一带向金发动进攻，金亦分兵六路侵宋，宋军惨败。宋理宗绍定六年至端平元年（1233—1234年），南宋与蒙古联手灭金。

最后看宋与（蒙）元战争。从金朝灭亡的第二年即1235年起，蒙古军以宋军收复三京，破坏宋蒙同盟关系为导火索，向南宋大举进攻，至1279年南宋灭亡，在长达45年的宋蒙战争期间，可以元世祖忽必烈即位（1260年）和

① 叶适：《水心别集》卷一《治势下》，《叶适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第641页。

② 《宋史》卷三三《孝宗纪》，第635页。

③ 王应麟：《玉海》卷一三五《乾道定十三战功》，扬州：广陵书社影印本，2003年；又见徐松辑：《宋会要辑稿》兵一九之一七，北京：中华书局，1957年。

④ 王曾瑜：《和尚原和仙人关之战述评》，《西南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2期。收入氏著：《凝意斋集》，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42页。

⑤ 李华瑞：《宋金太原之战》，《西北师大学报》1993年6期。收入氏著：《宋史论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1年。

⑥ 王曾瑜：《南宋对金第二次战争的重要战役述评》，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年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收入氏著：《点滴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10年。

宋理宗赵昀病逝（1264年）为标志分作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虽然蒙古军向南宋发动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开辟了全面对宋作战的战场，摧残了长江中上游地区若干大中城市，但总的说来，蒙古军建树不大，南宋军队在巴蜀、荆襄、江淮三大战场有效的阻击和重创了蒙古军的进攻，其中孟珙指挥的江陵之战（1236年）、邓穰之战（1240年）、黄州保卫战（1237—1238年），杜杲杜庶父子死守安丰之役（1237年），王安指挥的寿春争夺战（1244年）、余玠领导的嘉定会战（1252年）都是宋军取胜的重要战役，特别是1259年王坚和张珏指挥的钓鱼城之战大捷，重创蒙古军，蒙哥汗死于役。

1260年忽必烈即大汗位以后经过几年的准备，又开始进攻南宋，1269—1273年的襄樊战役宋军战败，同时宋元对峙以来，南宋藉以为国的巴蜀、荆襄、江淮三边守备也被（蒙）元军切割，至此南宋的防御体系溃乱不堪。1273年，元军发动全面灭宋战争，在两淮郢州、沙洋之役，湖北阳逻堡之役，江淮芜湖丁家洲之役，荆湖南北之役等重要战役中以摧枯拉朽之势击败宋军，1275年逼近临安，宋军又在焦山之战中大败于元，“宋军大溃，数十万众，死伤几尽”^①，“自是宋人不复能军矣”^②。翌年二月，宋帝出降。其后，虽有一二忠良起兵勤王，为宋坚守，但犹如大厦将倾，已非一木所能支撑的了。^③

从以上史实来说，宋朝在战争进攻和防御两个战略方面，其防御战在大多数情况下具有相当强的作战能力，因而在观察宋朝“积弱”问题时，应当充分估计宋朝在防御战策略中取得的不俗战绩。

三、宋与辽、西夏、金、元攻防战优劣析

以上简要叙述，有三点值得注意：

第一，宋与辽、西夏、金、元的战争总体上说，宋大多处于守势，但也有多次积极进攻的情况发生：北宋太宗、徽宗对于燕云地区的经略，北宋仁宗、神宗对西夏的战略进攻，南宋欲复北方故土而展开对金的数次北伐战争：岳飞四次北伐、宋孝宗隆兴北伐、宋宁宗开禧北伐、宋理宗端平入洛。宋的进攻战多以失败甚或击溃而告终。^④

① 《元史》卷一二七《伯颜传》，第3103页。

② 《元史》卷一二八《阿术传》，第3123页。

③ 详见陈世松等：《宋元战史》，呼和浩特：内蒙古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28—368页。

④ 宋的进攻战也有少数很成功的范例，如南宋初岳飞的四次北伐。参见王曾瑜：《岳飞和南宋前期政治与军事研究》，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103—147页。

那么宋进攻战败多胜少的原因何在？以往学界已多有讨论，除去从军政角度总结的有“招刺太滥、拣选不实、训练很差、军法的废弛、军政的腐朽，军纪的败坏，官员对军士的役使和刻剥，军队的赢利性经营，对骑兵建设的轻视，实行以文制武，兵权的分散，将从中御”等原因外^①，还从宋朝立国的形势加以探讨。南宋理宗时人吕中在《宋大事记讲义》卷一《国势论》中集浙东学派、朱熹等人的议论早有深刻的分析：

汉唐多内难而无外患，本朝无内患而有外忧者，国势之有强弱也。……而国势之所以不若汉唐者，则有由矣。盖我朝北不得幽冀，则河北不可都，西不得灵夏，则关中不可都，不得已而都汴梁之地，恃兵以为强，通漕以为利，此国势之弱一也。

这个分析即是 20 世纪学界强调，宋朝立国缺少与草原民族一争雄长的两个条件：一是以长城天险为依托阻御草原民族牧骑南下，以保障中原地区的安全。二是据有一片草原，繁衍马匹，编组为骑兵，主动出击，以机动对机动，以能够支持长期战争的国力为基础，终于战胜对手，成为国势强大之王朝。学界也大多认为：“北宋与边疆民族在兵种上，特别是骑兵力量上的差异，是其在军事上不能取得较大成就的原因。作为宋辽战争主要战场的河北平原的地理环境，又强化了这种观点。确实，这两种理解模式均有高瞻远瞩，与事实若合符节之处，其影响力历久不衰，本身就是对这点一个很好的说明。”^②

宋朝所处的时代正是北方游牧民族充当着战争舞台主角的时期，虽然北宋初年就发明并使用了火器，中国古代战争从此进入了冷兵器和火器并用时代，但在仍以冷兵器为主的战场上，骑兵以其行程远、速度快、机动性强，适宜于平原旷野的远程作战等优势，充当着主要突击力量。这也是因为，就力量而言，骑兵是人力和马力之合。^③对此宋人早有深刻的认识：“马者，兵之用，国之所恃以为险者也。有国以来，未尝无马，国多马则强，少马则弱。”^④由此审视上述宋与周边政权的战争，恰恰说明了进攻战非宋之所长，受其所限，失败也在情理之中。

① 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第 521 页。

② 曾瑞龙：《经略幽燕——宋辽战争军事灾难的战略分析》第一章，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1—2 页。

③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编：《中国战争发展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 年，第 298 页。

④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七四“元祐元年夏四月辛卯”，第 9067 页。